

Cheap Talk: Disa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.
Joshua St. Pierre.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, 2022. 180 pp.

萬宗綸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外國語文學系

Cheap Talk: Disa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(暫譯：《輕言薄信：障礙與溝通政治》) 是加拿大學者約書亞·聖埃皮爾 (Joshua St. Pierre) 於2022年出版的著作。此書屬於理論著作，但融入自我民族誌的寫作風格。約書亞本身為口吃者，在本書中時常奠基於自身的經歷，展開對溝通政治的討論。

譬如，他提及自身曾使用過的輔具SpeechEasy，能將使用者說的話以時間延遲的方式回饋到耳朵，造成大腦產生多人說話的錯覺，而抑制口吃。約書亞比較此輔具及日本的Speech Jammer (彈話槍)。Speech Jammer對著叨叨不休的說話者扣下板機，便能將他說的話以秒差的方式發射回去，使其口吃難以言語。約書亞指出這兩個科技產品應當理解為「操控設備」，讓個體成為「資訊資本主義」(info-capitalism) 中「資訊機器」的一部分，背後的邏輯均為「對抗噪音」，讓噪音成為普世且非關政治的敵人，而「失暢」(dysfluency) 就被框架為這種噪音之一。

約書亞所耕耘的「失暢研究」(dysfluency studies)，主要迎擊的是將障礙視為個人缺陷的醫療模式 (medical model)。他指出，即便障礙研究倡導用「社會模式」(social model) 將障礙視為社會壓迫的狀態，學者卻很少將目光放到溝通相關的障礙上，未能意識到言語生產是一種身體行動 (St. Pierre 2012)。《輕言薄信》批判性地檢視從過去到當代，社會對於言語相關障礙的理解與對待，如何鑲嵌在更大的社會與政治經濟結構之中。

第一章爬梳了生產體制中溝通位置的歷史。十九世紀下半福特主義下的勞動是靜默的，工廠裡的機器很大聲，讓人類溝通幾乎不可能，進入後福特主義

的即時生產時，敏捷的生產與資訊消費成為高度競爭市場中的生存方針，溝通成為了一切的前提，進入「聒噪勞動」（chatty labour）的生產模式。

既然溝通能力成為重要的資本，其所來自的身體也就成為資本流通的場址，是規訓的目標。十九世紀為了實作階級秀異（distinction），而發展出來的語言矯正科學知識，在後福特主義時代，成為量測何為語言標準以及語言偏差的知識來源，將言說主體加以分類且階層化。到了1930年代，心理學的發展，讓個體的言語成為內心強健的來源，言語障礙會導致神經不穩定性的惡性循環，導致經濟體制的崩解。

約書亞在此章提及，言語病理學逐漸成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下的一部分，言語必須先被馴化，個體作為說話主體才能在生產管道中流動。流暢的言語能力使個人變得可治理。然而，光是簡單的訊息傳遞並不足以充分挖掘溝通資本。否則，從障礙研究的社會模式來看，只要給足時間與調適，大部分有言語障礙的人是可以溝通的。溝通的編舞，講求在對的時間用對的方式來傳遞訊息。像口吃者這樣非規範的主體，打亂了時間的同步性，使其無法承載資本主義的時間要求。

第二章強調生命政治技術的特徵在於將生物差異自然化，藉此掩蓋這種差異的歷史過程，讓人們誤以為障礙僅僅是生物科學的固有現象。1950年代出現的操控學（cybernetics），是約書亞立論的重點，操控學將溝通化約為技術性過程，以最佳化為目的，讓溝通成為機械式的言說（machinic speech），缺陷的語言因而成為系統的噪音，需要加以排除。

新自由主義下，身體根據生產力、健康和競爭力等指標進行評估。這種過程不再是簡單的標記正常與病態之間的差異，而是對身體進行滾動式調整，讓其在不同的情境中發揮更大的價值與功能。

第三章將焦點放在資訊機器的順利運作，仰賴於他所稱的「資訊治療體制」（info-therapeusis）。他帶出了我認為是此書最形象化的分析概念——「說話的頭」（talking heads）。在英語的語境中，talking heads可指電視上發言者的頭部鏡頭。在此書，翻譯成「說話的頭」能捕捉言語的廉價化，亦即說話者的頭宛如只是資訊機器的螺絲釘。在後工業時代的資訊系統中，「說話的頭」要按照機器的需求進行思考和溝通。他們並非真正理解或評判，並不自發性地

產生原創的說法，只是連結、翻譯和流動的工具，是機器系統中的中繼站。

在這台資訊機器裡，言語失暢者像是鏽蝕的零件，讓機器無法好好運轉。因此，資訊機器本身仰賴著「資訊治療體制」以排除這樣的問題零件。約書亞指出，這個治療體制先是對個體強調「個人化的治療實踐」，再讓個體經歷「去個人化的機器奴役」（machinic enslavement）。

約書亞也對言語病理學做出批判。在這本書中，他辨認兩種言語病理學的運作邏輯，這兩種邏輯相互依存。首先是「刻紋模式」（striating mode），言語病理學鑲嵌於一套知識與權力階層秩序中，將不同的身體辨認出來，並組織他們之間的上下關係；再者，言語病理學開啟「平滑模式」（smoothing mode），聲稱要將這些差異的身體，都縫合到機器上，使其在社會中的功能最佳化，讓身體有潛力與其他身體接合。

這種言語病理學的運作邏輯，對於約書亞而言，便是在服務資訊機器。若我們將言語病理學視為提供「無阻」（access）的知識體系，那麼我們必須辨認，這是「消費性無阻」（consumptive access）。亦即是允許人進入儲存空間使用某個文件，卻是「唯讀模式」。這是在包容的旗幟下，將身障者召喚成為是治療科技的消費者，但卻不是共同定義何謂溝通的平等夥伴。約書亞進一步指出，障礙政治要的是「轉型性無阻」（transformative access），要擁有讀取權，也擁有文件的編輯權。身障者要能夠參與重新改造與設計遊戲規則。

最後一章是較「實務」的部分，能對障礙政治帶來延伸思考。以「直言」（parrhesia）為題，援引這個古希臘雅典民主中的重要成分：自由、坦率、無畏的言論，約書亞建議將言語失暢想像成一種直言的形式，是勇敢的、誠實的，而且有風險的說話方式。在此，他區分出四種關於「直言」的理解，對於障礙政治是相當有意義的見解。

第一種是「治療後的說真話」（therapeutic truth-telling），約書亞並不認為這是一種「直言」，因為語言治療的邏輯將言語障礙辨認為阻礙言說主體表達內心「真正聲音」的障礙，治療體制能協助障礙主體誠實地將真話說出來，以完整個體的身份認同。第二種是「柏拉圖式直言」（Platonic parrhesia），從柏拉圖哲學來看，舌頭在被信任前，必先馴化。約書亞指出，歐美的障礙權利運動在歷史上由肢體障礙者領導，因為他們能夠成為「說話的頭」，製造平

等權利論述；然而，這卻排除了那些不屬於語言社群範疇的障礙者。第三種是「欺騙式說真話」（mischievous truth-telling），約書亞指出「口吃者」如同網路酸民，破壞溝通的遊戲秩序，若作為一共同行動，能顛覆根深蒂固價值。

最後，「犬儒式說真話」（cynic truth-telling）可謂是最基進的一種。言語失暢者可以乾脆「不尋求被理解」、「不追求被認可」。在此，約書亞要我們擁抱失暢的聲音本身，肯認言語的下賤（shitty）與物質本質。他指出，「拒絕承認」（to refuse recognition），就是要變得無法被理解，用自己的身體本身去體現一種對體制的批評，讓眾人意識到，原來可理解性（intelligibility）是有明顯的邊界；同時，這種真話模式是要變得「無法察覺」（becoming imperceptible），要不斷地成為他者，拒絕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化，這是對於「承認政治」的嘲弄。

《輕言薄信》一書，運用資訊資本主義作為脈絡，發展出機械性言語，以及概念化個體在此機器中的零件角色，讓言語障礙者在當代生產體制中受到的排除，得到深刻分析。這個視角，不僅僅將障礙視作一種社會壓迫，更能看見言語溝通如何含納於當代生產體制，能夠為障礙研究者在分析障礙者的溝通經驗時，提供理解上的協助。

而書末提出的反抗模式，讓我們看見依循這個資訊機器架構下，要抵抗這台機器，確實有其門檻。尤其是「犬儒式說真話」的概念下，譬如：聾人力爭手語翻譯員制度的建立，以確保資訊權的行使，是否也是落入了資訊機器的圈套？若此，拒絕主流體制的承認政治，是否意味著唯有進入部落主義，聾人建立自給自足的手語國度，才能真正地脫離當代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主體化。那麼，這樣的建議，是否有其實際意義，也許是障礙研究者需要思考的。

參考書目

St. Pierre, Joshua

201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abled Speaker: Locating Stuttering in Disability Studies. *Canad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Studies* 1(3): 1-21.